

走向西南 扎根贵州

西南服务团团史资料贵州专辑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史资料贵州征集组

1988年12月

目 录

宋任穷同志题词（封面内页）

在西南服务团干部动员会上的讲话……………邓小平（1）

西南服务团贵州干部队组织史

……………团史资料贵州征集组（13）

进军大西南的贵州干部队……………方士新（20）

贵州青年工作的开拓者

——回忆汪行远同志……………达 昭 李 骥

穆 颖 胡一民

刘光帜 杜 枚（28）

西南服务团的浙大贵州籍同学……………熊镇燕 吴清融

朱民一 安瑞琮 杨邦选（36）

到西南去……………刘扬深（43）

赠西南服务团战友……………叶瑞兆（59）

从南京到贵阳……………杨浩青（60）

在西南服务团的日子……………洪 业（66）

起步……………沈斐宇（73）

到大西南去……………肖万林（79）

西南服务团工程队简史……………朱绛侯（82）

忆南京新闻干部训练班……………夏 岚（84）

战友赠诗……………杨美清 王宗漂（87）

战友通讯录……………（88）

在西南服务团干部动员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于南京

这次二野和地方工作的同志到西南去，到川、康、云、贵四省，解放整个西南地区，并把那里巩固、建设起来，这是一个很伟大，也很困难的任务。到西南去，队伍听到这话，思想上就有活动；地方工作的同志听说思想上也有些活动，听说那里很远、很穷。有些同志感到离家太远；有的同志感到其他地方都安好家了，我们要走几千里路，在思想上有点抵触。实际上，这是没有讲清楚。事实证明，把问题讲清楚了，大家也就高兴去了。有的这个月二十八、九开动，有的已经开动了，下个月二十日左右全部离开南京，开始一个小长征，大约四千多里。路是远一些，但还可以坐段火车、船，不过大部还是要走些路。走，不是很仓促，而是很从容。一靠近了部队，就要和部队会师。要把班子搞好，准备好，一进入指定地区就要开展工作。

今天，就讲一讲到西南工作和用什么态度去西南工作的问题。

这里，想首先谈谈西南的一般情况。把西南作为一个概念来说，是八个字：“前途很大，困难很多。”对这句话的理解很重要。西南有七千万人口，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与苏联比，相当于苏联的乌拉尔，建设条件好。有的科学家很赞赏西南，

那是将来的大工业基地之一，前途很大。我们去是有目标的，就是要我们去把这个地区建设起来，不是要我们去充军。党给了我们很重大的任务，正是看得起我们，要我们去工作。但是，实现这个任务，困难很多，需要我们去逐步克服。

西南地区，无论工业、农业、商业，都有很大前途。农业是丰富的。四川省每年要收九百万担粮食，这还是在农村破产的条件下，云南足以自给；贵州有余，西康问题不大。农村出产大批猪源。桐油问题全国外汇的重要来源，产量占全国的80%左右，主要产于四川。商业上，西南不是怕进不了货，而是怕出不了口。西南是出超的地区，进口货主要是棉布。除布不能自给外，其他是可以关起门来不要外面进货的。工业上，抗战以来起了很大变化。八年抗战根本谈不上什么工业；抗战以来，重庆为国民党陪都，工厂内迁，打下西南工业的基础。重庆附近的重工业超过上海。就全国来讲，重工业第一是东北，第二是四川。全国现在只有重庆能出钢轨，每月最高产量能铺四十公里铁路。一千吨以下的轮船也可以造。四川兵工厂占蒋介石统治时全国的60%（包括东北在内），军工工人最多达到七万人，现在还有三、四万。如果除去东北，四川军工工业占蒋介石的80%。现在每月可产子弹八百万发，一万条步枪，以及各种炮类。资源委员会的企业也不少，公营私营工厂不下一千，而主要重工业都掌握在国家手里。还有四川的盐产也很丰富，如加以改良，降低成本，前途很大，是个不可忽视的资源。历史上，皇帝财富的主要来源一在扬州，一在四川。此外，四川还有大批矿、山货尚未开发。根据一些科学家、工程师研究，西南矿产也很丰富，如贵州、云南、西康的矿、铁等。把四川作为一个体系来说，样样不缺。金

沙江作为国内大渡河等“坝子区”，就是我们将来的重要工业区。所以，西南农、工、商业都有基础，不是白手起家。将来，我们的国防，都要建设在西南。西南这个地方，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苦，饭是无论如何有吃的；如果实行了土地改革之后，把与外界的交通搞好，则粮食还要输出。国民党在三年内战和八年抗战中，粮食主要靠四川、湖南。这说明我们建设西南在经济上的优越条件，不是坏地方。建设条件具备了，需要我们的的是主观努力，这就是党中央给我们的任务。

另一方面，国民党十二年来在西南虽然做了点好事，打下了一点工业基础，但它做了点坏事。经济上的破坏很厉害。人民大批破产，失业者很多，无业游民很多，抽鸦片者很多。我们想到前途，也要看到困难。恢复经济要花很大的力量和相当长的时间才行。据说四川近年来种了树林，农田都干了，地主更残酷地剥削农民，主要更集中了；许多主要农产品如石油、猪鬃、油等家庭手工业和副业都有降低；盐产也有破坏，因成本高，市场小，销售停滞；工业停了很多。所以，西南的工、农、商业都有相当的基础，但被破坏的都很厉害，恢复不容易。

在政治上，自民国以来，西南多年处于封建军阀割据的局面。抗战时，国民党进去，名义上统一了，实际上从未统一过。西南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比山东、河北还要大些。封建阶级掌握武装，进行长期的大大小的割据。有人说四川省有枪近百万条，可能夸大，但大体上全国民族多的首算西南了。四川历来保持有六十万军队。土匪也比较多，可能有点象河南的情况。土匪、地主、军阀加流氓，四者结合起来。我们去工作，思想上要准备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

要估计到封建势力很强大的敌人，要估计到封建势力加上国民党经营了十年到十二年的法西斯统治基础。我们去时，他们是要破坏捣乱的。当然这些封建势力也不是统一的，内部矛盾很大。如果我们懂得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我们的事情就好办。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一条，在策略上切记不要树敌过多。同时，由于土匪、流氓、哥老会、豪绅、恶霸、军阀相结合，残酷镇压和疯狂剥削人民，人民要求解放。所以“点火”也很容易。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这是说明群众运动容易发动起来，但坚持下去也不易。无论学运、工运、农运都有这个特点。所以，到西南去一定要懂得这一点：发动群众起来有办法，但组织群众、一步步提高群众觉悟很重要。如果只靠军队和外来干部的力量搞起来，一定不能坚持。要知道敌人很强大，有武装，但他们是分散的，矛盾很大，群众容易点起火来；只要我们利用矛盾，组织教育群众，一步步提高群众觉悟，把运动不断引向深入，由低级到高级，那么，打垮这个敌人，也不是怎么困难的。云南可能好些，现已有二、三十个县政权，二万游击队，九千名党员。

我们这次到西南，遇到的头一个困难，还是几十万军队的供应问题，是吃饭问题；什么群众运动、生产工作，都还在后面。工业还未搞起来，这样大的工业、约五万多工人要维持起来。养活五万人的工厂，等于养活二、三十万人的军队。还要接收很大的国民党的官僚机构及其相当大的军队。胡宗南的十几万，宋希濂、孙震的十几万，云南一个军，贵州一个军，加上军事学校共约四十万。上海旧人员是三十万，等于一百至一百二十万人开支；西南十至二十万，即等

于六十万人开支，共为一百万。加上工业的二十万，则为一百二十万。一百二十万人要吃饭、安插。因此，除开我们的军队及工作同志的供应以外，还要养活一百二十万人。对旧人员的处理，华东曾出了些毛病，一脚踢开，没饭吃，骂共产党，做流氓，现在还得请他们回来。所以毛主席说：三个人的饭匀作五个人吃，准备养活这一百多万人。这是我们要实现的诺言。浙江的国民党军人被推出去就当土匪，给我们增加很大困难，不如先养起来加以训练。所以，这个包袱不能不背。随便遣散旧人员，随便释放俘虏，是张伯伦政策。所以，到了西南，第一关不是发动群众、恢复生产问题，而是吃饭问题。能不能把西南搞好，就看我们能不能养活这批人。因此，财政工作加强，必须设法增加收入。要拟定一个财政计划，大家坚决执行。眼睛不要光看上级和银行，光靠发行钞票是不行的。

在西南，除帝国主义封锁之外，沪杭曾经遇到的困难，要全部出现在西南。因为西南是最后解放，一切困难都落在西南。所以毛主席说：不要把胜利宣传太多了，要多想想困难。现在，在党内，主要的不是宣传胜利。胜利了，有人就想自己的个人问题。要了解，胜利之后，接收了国民党的很大、很烂的摊子，这是很大的困难。我们强调的应是这些困难：要正视困难，准备克服困难，想各种办法去克服困难。

在我们的主观力量上，不够强。从西南服务团起，直至下边，都不够强，除了几十万军队之外，从各地集中的工作干部，县委委员以上的大约一千二百人，区村干部大约五千人，共六千二百人，大约比东北调到江西的要少。还有大约一万名学生，其中大学生三千多，大部分是高中学生，是要经过锻炼以后才能发挥相当的作用。此外，在四川和贵州

一部分地区，约有九千地下党员。云南有九千地下党员，有行署、专署、县政府二、三十个，解放区人口三百万，二万游击队。因此，不可避免的要依靠部队主力。几十万军队，不但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这样一来，我们的主观力量在数量上是足够了。七十万人搞七千万人的工作，这力量是从来没有过的。抗战初期，八路军三个师到华北散布在一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不过五万人，只几百个地下党的同志，也做出了成绩。现在力量当然多，但从质量讲，又不够。县以上及区村干部，按正规配备，只够两至三个区党委（以农村为对象）。而在西南，我们准备要有五个区党委、两个省委及中央直属机构。四川四个区党委，以重庆、成都、顺庆、泸州或自流井为中心，每个地区一千至一千五百万人口。云南、贵州两个省委和相当一个区党委干部配备的西康省。所以，平均起来，七个单位只能各配备一百多个县以上干部，其中还包括一些重要的大城市。好在我们还有地方党员，他们好的地方是熟悉情况，与群众有联系，缺点是接触党的政策差，而且分布不平衡。但是，就是加上他们也不够，这就不能不依靠几十万军队。所以，部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任务亟待解决。特别是我们的财经工作人员更少，大家要下决心在这方面拈，去解决财政问题。地方工作同志，地下党同志，以及军队的同志，都得从头学起。我们要普遍的学习，以求得困难的时间短些。以这样的条件去接受这样繁重的任务，第一关吃饭问题就不容易过，搞不好，也会影响全国。在远离老区的情况下，主要靠自己。华东局今后工作是三个步骤：1、接管城市；2、城市大体接管完毕，将主要力量放在农村，三到五年完成土改；3、放手发展工业。

家大要学习华东局新区工作的三个步骤的指示，把农业西南变成工业西南，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向。

总之，西南的情况复杂，我们的任务繁重，主观力量在短时期内不够，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但我们干部数量大，群众容易发动，城乡经济虽受破坏但本身并不穷，有发展的基础。所以，只要我们大家努力，困难一定可以克服。

以上是一般情况的介绍。

有困难，就要正视，一定要认识，一定要克服。对每一个困难，都要从实际出发，采取具体的有效办法，而只要以下三条办好了，克服困难就有了基础：一是内部团结搞好，会师搞好；二是依靠西南人民；三是统一战线搞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团结好；对敌人营垒中能分化的分化出来，能争取的争取过来，能中立的中立起来，不要树敌过多。对敌人要象剥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剥，先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然后各个击破，以达到最后打倒敌人。

先说团结。首先是会师会好。这次到西南去的是四面八方的同志，大的来说有部队同志与地方同志，有外来同志与本地同志，六千二与一万八。而外来的六千二百干部中包括了全国五大解放区来的。好处是可以集中五大解放区的经验，缺点是来自四面八方，经验不同，有差有好。在一个问题上，有不同的办法，有的是几个办法都行得通，有的是几个办法都不能用，有的是这个办法好而那个办法不能用。人总是相信自己的（自信心强是优点）。由于解放区过去是处在被分割的情况下，作风上也可能不同。单说生活待遇，穷的地方就差些，好的地方就好些。要做到在思想上、步调一致，而且在生活上打成一片，就要所有的同志都自觉地认识

这问题的存在，人人都有意识地去解决它，问题就好解决了。我们力量本来就不够，如果我们内部还团结不好，还要花很多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就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影响。渡江以后，会师搞不好的，主要就是自觉性不够。只要有一方面自觉了，情况就不同了。在思想上，要尊重别人的经验，不要自以为是。自己的经验，特别是经过实验的经验很宝贵，但别人的经验也宝贵。要虚心些，“条条道路通共产主义。”只是事务性的问题，让一些步也好。遇到别人不对的，要有意识地在党委会上来解决，诚恳地说明道理，多数是会赞成正确意见的。即使多数人决定错了，按错了的做了再说，自己的正确意见可以保留。特别是正确方面的，如果抱好的态度，往往能很好的解决问题。正确意见必须坚持，形成决议后，还可坚持，报告上级。

关于干部分配问题。每个同志都要主动想到工作岗位问题。由于干部从四面八方抽调，而且现在才会齐，领导上对干部的了解与分配免不了有不够周到的地方，这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服从工作需要，并适当的照顾，这是我们对地方干部使用的两个原则。有的同志常常想不开，或认为降了级，受了委屈，当地同志也有人认为受了委屈。这就要从大的利益来考虑。组织部处理问题只能是比较适当，从来没有人人满意的。到西南去，上面机关要精干些，务使下面充实，因而下面就可能拥挤些。所以，到了西南，工作不一定能分配得人人满意，分配到过去熟习的工作岗位。我们的财经工作干部最缺，有的同志还要改行做财经工作。在政权上，还有可能把党员的放在非党员之下，我们的同志也可能不舒服。但这是党的需要，应当服从组织分配。除了配备适当的人到地方上

去之外，我们还要指定一定地区给一定部队以任务（迅速分散、剿匪），这也可能发生不如意的事情。对此，有的同志想得开就舒服了，想不开的就不舒服。在思想上要这样的准备，我们是要去把工作搞好，地位问题不要太看重。同时，要认识到，到新区去，情况不熟悉，我们能力还不够，一件事情，光靠自己一个人是办不好的，必须汇合各方面的力量。比如搞一个三、四千人的工厂，并不比一个区党委书记容易做，那是一个大产业家了。所以，对工作一要看性质，二要看党的需要，三要看周围的环境。凡是根据党的需要、符合党的利益工作，有时受点委屈，也要乐意接受。这是共产党员的品质，不应该去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在开始时，工作上只是大体上分一分，将来谁是英雄，谁对革命工作最有贡献，再采取逐步的个别调整的方针。德才、资之首就是德，看他是否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党的事业。才是第二，是指工作能力，资不是资格，而是与群众的联系，在群众中的声望；资格并不能决定一切。到西南去，打算逐步求得干部配备的合理。在工作中搞得好的提上来，搞得不好的下去。有时可能被迫把一个不适合于该岗位的同志派去做那个工作，这叫革命需要。这种态度对会师很重要。山头主义情绪是要不得的。七大之后，除了毛泽东山头之外，不容许有别的山头；有就该打倒。在会师中，双方都要看自己的缺点。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是自我批评，这是党内思想斗争的武器。必须运用自我批评去搞好关系。总之，无论部队、地方或者区域，总的是按工作需要，服从党的分配，加上一条，适当的照顾。这个原则，在开始时一定会有不周到之处，可能有放高了的，也可能有放低了的，但以后会按工作

成绩逐步作个别的调整。老实人会有好的结果，总可以得到党的信任的。在关系问题上，外来与本地，外来的负责；部队与地方，则部队主要负责；各部门之间，则主要负责者负责。人人都要自我批评，人人都要虚心些，都要认识到自己不够。西南有与全国各地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经验要结合实际情况才有用。

总之，团结搞好了，工作也就好搞，这一条非常重要。

二是团结依靠西南人民。这次去西南，干部少，开始时会有很大困难；但也有好处，迫使我们走一条正确的道路。干部充足的时候，往往可以靠发号施令、用命令主义来勉强完成任务，甚至听取意见都有有一定对象，但对如何走群众路线，如何依靠当地人民，如何培养本地干部、发现积极分子，如何团结当地人民的大多数，就每每被忽略了。到江南来的干部，命令主义、脱离群众很厉害，就因为依靠有一个班子，用老办法可以办事。干部少了，就被迫要从本地想办法。一开始就被迫联系本地群众，发掘本地群众的力量。当然，这样做不容易很快见效，但从长远来着眼，就很有利益。这样，我们就要去办训练班，注意办农会，注意改造贫苦知识分子，去培养教育农民积极分子，这就可能使我们与当地人民建立起血肉关系来得快。干部多，也应当这样做；干部少，则不能不这样做。老区干部常有命令主义作风，到新区，最怕脱离群众，以统治者自居。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尤其是部队。主要是领导上要说清楚，要防止。这次去西南，县以上干部要注意，要好好教育几十万军队和五千干部，人人都要抱着为西南人民服务的态度去工作，不是去当统治者，不应以解放者自居。人民的解放主要靠人民的力

量，加上领导的帮助。

第三是把统一战线搞好。统一战线的对象是一切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力量。四个朋友中，工人、农民是没有怀疑的，重要问题是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其特点，与欧洲的资产阶级不同。欧洲的资产阶级基本反动。中国资产阶级曾跟过蒋介石走，但他爬不上去；抗日时期，他们搬到大后方；反蒋中，他们大部分走到我们一边。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是能与我们合作的。今天，有无产阶级领导，我们不怕资产阶级造反。而且，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四个朋友之一，他们是跟我们一道走，和我们长期合作的。另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他们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有剥削，但团结他们、鼓励他们开工厂发展生产，是有利于我们把农业国改变成工业国的。除了与四个朋友团结好之外，还不可多树敌人。能争取的争取过来，能中立的中立起来，以便孤立最坏的。傅作义、程潜都过来了，就是这个原因。到了西南，一定会有人倒向我们这边来，无论是蒋介石的嫡系或是地方上的，我们都不应拒绝。这是敌人内部的分化，我们要会利用，以便各个消灭敌人。在北平，每次见到毛主席都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到了西南也可能有他们做主席、我们做副主席的事情，思想上要准备好。四川的袍哥问题很复杂，也可以进行分化，但主要是置之不理，不要让他们以为我们很重视他们。在接触时，只是以地方人士的身份与之接触。总之，要提高策略思想，少树敌人，团结朋友，利用矛盾，善于争取反动阵营中一部分并不反动到底、愿意做我们朋友的人，即使做短期的朋友也好。不要以为我们几十万军队，一

下子可以打倒一切，这种想法是危险的。光靠共产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过去，中原的教训就是树敌过多。当然，这是在消灭敌人的原则下灵活运用策略，目的是要消灭敌人。

联系群众也好，统一战线也好，最好的方法就是开代表会。我们可以用各界人民代表会的形式来联系群众、进行统战工作。凡是使用这种方法的地方，无例外的都收到很大的效果。两万人口以上的一切大、中城市无例外的都要召开，并应注意代表们的代表性。要吸收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参加，甚至有意识吸收一部分并不坚决反动的人；即使有一两个反动派参加也不要紧，正可以提高我们的警惕。就是各个小县城、区政府也可以召开，以宣传我们的主张，提出问题，大家讨论，求得解决。要耐烦地、虚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式，如统战部可以视为党外的组织部，把党外人士组织起来，团结起来。

以上说的三点是三个法宝，掌握得好，可以减少困难。其他问题还很多，今天不谈了。总之，去西南，思想上要准备吃苦，面对困难，面对一些不如意的事。最后，还要加上一个：好好学习，向西南的人民、向周围的同志们、向毛主席、向党中央的指示，好好地学习！

（转载自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团史资料选编》第三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

西南服务团贵州干部队组织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团史资料贵州征集组

(一)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迅速解放了南京、上海等城市。同年6月，党中央决定把解放和接管西南的任务交给第二野战军。为了作好解放西南的干部准备，一面从老解放区调配地、县、区三级干部作为解放西南的骨干，一面在沪、宁、杭新区动员大批知识青年参加我军，组建西南服务团。

由粟建团工作于6月下旬在南京、上海、无锡、杭州一带展开。各地学生联合会在各大中学校学生中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工作，大批学生踊跃报名。南京新华日报刊登了招考西南服务团学员的消息并配发了短评，报名的达3000人，经考试决定录取1400余人并在新华日报公布。各地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学员，先在当地集中进行组织和初步的学习，然后于7月下旬先后到南京集中。7月28日，全团学员4000余人在南京原行政院草坪召开成立大会并举行开学典礼，接着转入紧张的学习。

在西南服务团两个月的学习期间，第二野战军和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如邓小平、宋任穷、张际春、栗裕、彭

涛、冯定、曹荻秋、李达、石西民、周兴、张庆林、张渝民等，先后向全团作了关于革命理论、形势与任务、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等方面的报告，全团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

在此期间，从华北、华东各地抽调的军队和地方干部，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山东分局党校、皖南革命干校等单位抽调往西南的干部也陆续到南京集中。西南服务团的编制日益扩大，发展到近1万人。

9月下旬，西南服务团完成了学习的任务，为便于执行解放和接管西南的命令，将全团人员按接管地区重新整编为川东、川南、云南支队和贵州干部队。支队之下再按工作系统编为财经、公安、新闻、文艺、技术等大队。各队在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前后，告别南京，开始了向大西南的进军。

西南服务团接管贵州干部队（二）

贵州干部队原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大队，成员都是云贵川康省籍的干部。遵照中央的部署，贵州解放后主要由原冀鲁豫区党委的干部接管。同时，党中央从东北、华北抽调了一批原贵州或西南籍的干部参加贵州解放后的工作。如党中央在东北地区抽调云贵川康省籍干部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大队。其中贵州省籍的干部，共有十几个人，即伍嘉谟、黄颖、方士新、吴之平、穆家安、张绍清、罗永昌、陆汉卿、薛德明和张秀英等。他们有的是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参加红军的，有在湖南、江西等地参加红军的，有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到延安、到八路军或新四军的，有的是贵州地方党输送出去的。

他们从长春来到南京后，即与西南服务团内一批准备调

到贵州从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的干部相汇合，组成西南服务团贵州干部队。这批团的干部是中央组织部从当时北平华北大学抽调来的。他们一行10人，即汪行远、李骥、（贵州籍），达昭、刘光帜、胡一民、蓝骏、杜枚（四川籍），还有穆颖。其中不少同志曾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与此同时，二野决定将西南服务团的一部分贵州籍学员，编入贵州干部队，他们是：刘君恒、熊镇燕、朱民一、王文阁、安瑞琮、吴清融、杨帮选（原浙江大学学生）、沈锐、陈开定、肖万霖（原中央大学学生）、杨德政（原暨南大学学生）、沈斐宇（原复旦大学学生）、陈中平（原政治大学学生），还有原为其他大学或其他方面的，如丁西奎、陈守铭、洪嘉荣、陈含、雍泽、张人隽、杨永、蔡之诚、邱冈、邱素行、应雪樵等。

二野还决定，将团内原南京新华日报社和新华社南京分社合办的新闻训练班学员叶瑞兆、杨浩青、叶苓、党铮、章德新、石佩华、夏岚、蔡瑞生和马一萍等，还有西南服务团的吴克卓，编入贵州干部队。他们原来也都是大、中学学生。

上海、南京这批青年学生，是积极响应解放大西南的伟大号召，参加西南服务团的。他们不贪图个人享受，不留恋大城市的舒适生活，决心跟着共产党，为解放大西南贡献自己的青春。他们的家庭多在江南一带（包括有的贵州籍青年），一些同志为了避免父母的阻挠，有的隐蔽行踪，有的托人向父母说情，毅然投笔从戎。他们中不少人曾都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蔡之诚、刘君恒、熊镇燕、吴清融、丁西奎、杨德政等都是地下党员或上海一解放就加入共产党